

從蘇俄軍人逃亡談到蘇共權力轉移

畢英賢

前言

九月六日蘇聯飛行員貝林科中尉駕駛一架蘇聯空軍最新型的戰鬥機米格二五，降落在日本的函館機場，請求政治庇護，不願返回蘇聯而願定居美國。蘇聯政府要求「立即送還」蘇機，日本則堅持，蘇機侵犯日本領空，理應「扣機檢查」。於是，蘇日關係轉入低潮。這是貝林科事件在蘇聯對外關係上所發生的明顯影響。值此蘇共老領導面臨過渡之際，這一事件會不會在蘇聯國內政治權力鬥爭方面發生某種程度的影響？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探討，貝林科逃亡是個別的，孤立的事件抑或是蘇聯社會不穩定的許多現象之一？在理論上，影響權力鬥爭結果的獨立因素很多，但除了極少的強力因素外，大部份是輔助或促發因素。貝林科事件或可納入後一分類中。

本文無意誇張貝林科事件的政治意義，僅是以它為起點，來探討蘇聯社會對現行政治制度的反應與當前蘇共領導權所面臨的過渡問題，以及前者對後者可能發生的影響。

蘇聯軍人逃亡的社會意義

蘇聯軍人貝林科要到美國去政治避難並不是一件個別的、孤立的事件；九月廿三日另一蘇聯飛行員扎奇苗夫中尉駕駛一架小型運郵飛機在伊朗降落，也不願返回蘇聯。這兩宗事連續發生，引起蘇聯當局十分不安，假如飛行員繼續外逃，對莫斯科的聲望、威信和國內民心士氣的打擊，都很嚴重。

客觀言之，貝林科及扎奇苗夫中尉逃亡的動機有兩個可能：一是反抗蘇聯現行制度；一是基於個人的原因。但是，仔細推敲一下，就會發現，這兩個原因不是互不相干的兩回事。在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中，個人生活的大部分是由制度支配的；因此，對制度的不滿和個人生活的挫折是一體的兩面。

從一九七四年起，蘇聯的反抗制度的知識分子相繼被驅逐出國或者外逃，而九月裏兩起軍人連續逃亡事件似乎意味着這種傾向已

開始擴大到反制度的自由派軍人了。談到此一趨勢，就有必要提一提另外幾件漏出蘇聯嚴密的新聞封鎖而已爲世人所知悉的軍人「反叛」事例。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軍隊侵入捷克，一些士兵脫離隊伍站到捷克人民中間，有幾個師由於士兵對侵略行動的不滿，入侵後不久就被調回。一九六九年，一艘核潛艇上的水兵在里加海軍基地譁變。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蘇聯的導彈驅逐艦「警戒」號上的水兵在波羅的海的航行中譁變，蘇聯當局緊急出動飛機和軍艦進行鎮壓，約有五十名水兵被當場打死，其他參加者後來被判刑。在「警戒」號事件之前的一九七二年，一艘核潛艇上的人員和加利洛夫少尉等成立了名爲「民主主義社會解放同盟」的軍中地下組織，發表宣言，要求民主化。這一事件曾使得蘇聯軍事當局對反制度派軍人的活動大爲擔心①。

蘇聯當局對武裝部隊的控制一向極爲嚴密。在軍事教育中，一貫強調意識形態鬥爭與鐵的紀律。此外，蘇聯的特務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蘇聯的武裝部隊中從上至下佈置有嚴密的控制系统，官兵的言語行動都受到嚴格監視，稍有越軌即遭處分。

因此，僅就蘇聯軍事系統言，軍人之逃與亡及譁變等反制度的行爲，不僅顯示軍中不滿現行制度的情形，也顯示軍紀鬆弛、士氣低落。如果這種事實存在，確實會令蘇共領導者擔心。軍隊本來是組織嚴密、注重紀律、強調政治教育的；如果軍隊尚不能嚴加控制，如何能够控制其他組織或團體？倘若軍中反制度分子與社會中的歧異分子互相連繫，問題就更嚴重了。

對蘇聯政府而言，防止軍人外逃也許並不太困難；但是，消弭軍人外逃的原因以及貝林科事件的影響，却不能輕易辦到。小而言之，這牽涉蘇共的軍人政策問題；大而言之，更牽涉到整個政策和政治制度問題。在可能的蘇共高層領導改組或權力鬥爭中，政策問題往往具有決定性作用。

蘇聯的權力結構

談到蘇聯領導權過渡問題，必須先檢視蘇聯權力的結構與權力所在。目前，所謂集體領導，一方面是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國家元首）包戈尼、以及部長會議主席（行政首長）柯錫金三人齊頭並進；另一方面，一切重要決策和法令皆先由蘇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十六名成員（死亡一名）的多數議決。在三頭馬車中，以布里茲涅夫馬首是瞻；在政治局成員中，布里茲涅夫在接納新成員或逐出舊成員方面擁有較大的便宜，且有權更換中央委員會各工作組的負責人。因此，這種集體領導——或更確切地說，寡頭政治——與昔日史達林時期的獨裁政治祇是程度上的差異。

現今政治局成員的平均年齡在六十六歲以上，去年有關於布里茲涅夫病重的傳聞，今夏復有柯錫金生病的報導。雖然沒有關於包戈尼病臥的消息，但是他今年也已七十三歲。從這些事實看來，蘇共領導權力轉移應該不是很遙遠的事。

註① 「蘇聯軍官，有人酒精中毒，有人做黑市生意」，信使週刊（日），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蘇聯共產主義政治體系下，權力過渡通常有四種情況：原有領袖去世；原有領袖因病不能視事；原有領袖辭職不幹；原有領袖被迫下台。每一種情況皆會產生各不相同的政治後果，而在未來的蘇共權力轉移上，每一種情況皆可能發生；不過，依照布里茲涅夫（蘇共總書記）領導時期所表現的集體領導與領導階層的穩定性看，蘇共在下一次的領導權過渡中發生上述的第四種情況的可能較小。一般說來，當原有領袖被迫下台時，在領導階層中祇有一部分成員參與有關繼承問題的決策。在其他情況中，諸如總書記死亡，每一個有投票權的中央政治局成員皆發生同等的作用。附帶說明一下，這裏所說的領袖就是蘇共領袖，也是蘇聯實際政治的最高權威。

事實上，布里茲涅夫之成為蘇共領袖人並非依賴其下層追隨者的擁立，而是蘇共領導階層同僚的「挑選」^②。既然是「挑選」就會有一定的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健康狀況、當時職位，以及民族背景。就這些條件論，在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被逐下台時，布里茲涅夫沒有遭遇到強有力的對手，因為柯茲羅夫（F. R. Kozlov）^③當時病重，伏羅諾夫（G. I. Voronov）、波里揚斯基（D. S. Poliansky）、基里林科（A. P. Kirilenko）及格里辛（V. V. Grishin）等僅佔據在第二等職位，而包戈尼的不利條件是他的烏克蘭籍貫。

當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四年剛上台時，其權力並無突出之處。例如，柯錫金（部長會議主席）參與一切重大的對外政策談判，有時獨自處理問題，不與布里茲涅夫諮商^④。但是，在十數年間，布里茲涅夫的權力與聲望逐漸上升，到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時幾乎已達到巔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很多政治局成員與中央委員公開讚揚布里茲涅夫，其讚美之詞的量與質誠非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時赫魯雪夫所身受者可比^⑤。

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委員雖然多已老邁，但是也表現出蘇共中央的穩定性。在這屆中央委員中，百分之八十九的正式成員連任；在八十九名新當選的中央委員之中，百分之五十九是由上屆候補中委或檢查委員提升。因此，中央委員的平均年齡也達六十歲。這種現象可以解釋為，布里茲涅夫同年長者相處比較適宜；也可能表示他不願以較年輕但有政治野心的人來代替那些年老的委員們。布里茲涅夫一再貶降謝立平，終於把他逐出政治局，就是因為謝立平極可能成為布里茲涅夫權力上的堅強對手。

註② 哈得賴特（Grey Hodnett），「蘇聯繼承的偶發因素」，共產主義問題，一九七五年三、四月號，第四頁。

註③ 柯茲羅夫，生於一九〇八年，一九五八年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一九六〇年轉任蘇共黨中央書記，他在若干問題上反對赫魯雪夫，被反史分子諷為「史達人的繼承人」。

註④ 赫夫（Jerry Hough），「布里茲涅夫時代，其人與其制度」，共產主義問題，一九七六年，三、四月號，第二頁。

註⑤ 例如，見：謝爾比斯基（V. V. Scherbitsky）的講詞，真理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六日，第三頁；拉希道夫（Sh. R. Rashidov）的講詞，真理報，二十七日第二頁；華貝科（A. F. Vatchenko）與格里希亞維楚斯（P. P. Grishkyavichus）的講詞，真理報，二十九日，第十六頁；契里亞耶夫（G. I. Chiryayev）的講詞，真理報，三月三日第三頁……等。

從蘇俄軍人逃亡談到蘇共權力轉移

由於布里茲涅夫阻擋年輕人員進入領導階層，消除有潛力的對手，結果在當前的蘇共領導人物中，就其年齡、工作經驗與所佔職位等條件看，很難找出一個接替布里茲涅夫的「合理」的繼承人^⑥。也由於這個事實，除非發生重大變故，布里茲涅夫被迫下台的可能性較小；因此，蘇共下次的領導權的轉移可能在布里茲涅夫的死亡，病倒或辭職的情形下發生。屆時誰會出來參加這場權力鬥爭？那些條件將成爲決定性因素？蘇聯社會問題將會發生多少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下試就這些疑問，加以探討。

蘇共權力鬥爭的決定因素

無論蘇共領導權將在何種情況下轉移，有資格參加這場鬥爭者，無疑都是目前佔據蘇共高層領導職位的那些人。這個領導班子是今年二—三月間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與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比較，「新人」極少。前此，因政策爭論或權力鬥爭而被逐出政治局的有謝立斯特（P. Shelest）、波立揚斯基（D. Polyanskiy）、伏羅諾夫（G. Voronov）及謝立平（A. Shelepin）。在候補政治局委員中，增加了一名新人，即阿里耶夫，他是阿塞拜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此外，新增兩名書記，一是日曼寧，一是柴爾連科。日曼寧曾任「真理報」總編輯、記者聯合會主席及大使等職；柴爾連科過去的主要職務是蘇共中央總務組的負責人。關於全部蘇共政治局成員及中央書記名單，請參閱附表。

附表：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所選出之領導集團及其政策立場之傾向

| 主要職務 | 姓 | 名 | 年 | 齡 | 民 | 族 | 政策立場傾向 ^⑦ （「+」肯定，「○」略同情，「-」不同情，「？」不明） | | 附註 |
|-------|----------|---|----|---|-----|---|---|---|------|
| | | | | | | | 視爲領袖 | 和 | |
| 布里茲涅夫 | Brezhnev | | 七〇 | | 俄羅斯 | + | + | ○ | 總書記 |
| 安德諾波夫 | Andropov | | 六一 | | 俄羅斯 | + | + | + | |
| 格里契科 | Grechko | | 六一 | | 俄羅斯 | - | + | + | |
| 格里辛 | Grishin | | 六一 | | 俄羅斯 | - | + | ○ | (死亡) |
| | | | | | | | | | |

註⑥ 赫夫，「布里茲涅夫時代……」，第六頁。
 註⑦ 這些資料係根據他們在一九七〇—七四年間所發表之演說而歸納出來的，見：哈得賴特，「蘇聯繼承的偶發因素」，第十頁。

政治局委員

柯羅米科 Gromyko
 基里林科 Kirilenko
 柯錫金 Kosygin
 庫拉考夫 Kulakov
 庫拉耶夫 Kunaev
 馬祖諾夫 Mazurov
 比爾謝 Pelshe
 包戈尼 Podgorny
 羅曼諾夫 Romanov
 蘇斯洛夫 Suslov
 烏斯汀洛夫 Ustinov
 謝爾卑斯基 Shcherbitsky

六七
 七〇
 七二
 五八
 六四
 六二
 七七
 七三
 五三
 七三
 六七
 五八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白俄羅斯
 哈薩克
 拉脫維爾
 烏克蘭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烏克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
 書記

政治局候補委員

阿里耶夫 Aliev, G. A.
 提密契夫 Denichev, P. N.
 馬希諾夫 Masherov, P. M.
 波羅馬廖 Ponomarev, B. N.
 拉希道夫 Rashidov, Sh. R.
 所羅門柴夫 Solomentsev, M. S.

六一
 六八
 六八
 七一
 六一
 六二

俄羅斯
 白俄羅斯
 俄羅斯
 烏茲必克
 俄羅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任)
 書記

書記

卡必登諾夫 Kapitonov, I. V.
 道爾格赫 Dolgikh, V. I.
 卡吐謝夫 Katushev, K. F.
 日曼寧 Zimyanin, M. V.
 柴爾連科 Chernenko, K. U.

六一
 五二
 四八
 六二
 六六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白俄羅斯
 俄羅斯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任)
 (新任)

從蘇俄軍人逃亡談到蘇共權力轉移

此處得作兩點說明，第一，附表所列各人以外的高級蘇共幹部並非不可能成爲角逐者，祇因偶然因素太多，難以一一列出可能的名單；第二，由於其他條件限制，表列人員並非必然成爲角逐者。

茲以年齡、健康、民族、淵源、學經歷及現任職位爲基礎，試指出那些人有可能成爲布里茲涅夫的繼承者。作爲蘇共的領導人最好在五十—六十歲之間，其次爲六十至七十歲，這與健康狀況有關；一個衰老或有病的人很難挑起這付担子。他最好是俄羅斯人，其次是白俄羅斯或烏克蘭人。幹黨務出身的優於政府工作者；最好受過高級技術教育；曾任重要地區的黨第一書記或中央書記，有廣泛的幹部工作和工農業經驗；既接觸過對外事務也經歷過民族事務；而且曾在莫斯科住得較久。政治局委員的可能性大於候補委員，書記次之；委員兼書記最好。

新進人員不列入考慮。目前佔最有利地位的是包戈尼，柯錫金及基里林科，但是皆因年紀太老不太可能接長蘇共最高領導職務；在佔有利地位的成員當中，有的不是政治局委員（如卡必登諾夫及道爾格赫），有的非正式政治局委員（如所羅門柴夫），有的在經歷上有嚴重缺點（如庫拉考夫及道爾格赫），有的民族背景上有問題（如馬祖洛夫是白俄羅斯人，又非書記）。在那些佔據較不利地位的成員中，有的太老（如蘇斯洛夫），有的缺乏完整經歷（如烏斯汀洛夫、卡吐謝夫、安德諾波夫及羅曼諾夫），有的與警察有淵源（不利因素）（如安德諾波夫），有的民族背景不對勁（如謝爾卑斯基），有的不在政治局內（如卡吐謝夫）。

從前一節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蘇共的領導集團內很難找出一個「理所當然」的人選，以接替布里茲涅夫總書記的職務。如果在近期内，布里茲涅夫不能視事，基里林科很可能暫時承乏。他目前是政治局委員兼書記，且負責蘇共組織事務。不過從種種跡象看，布里茲涅夫似乎不願或不曾在近期内罷手。因此，未來的接班人，需從五十至六十歲之間的人士中間去物色了。按照這一標準，可能人選則剩下：庫拉考夫、羅曼諾夫、道爾格赫及卡吐謝夫。此外，謝爾卑斯基雖然也是五十多歲的政治局委員，但是由於他是烏克蘭人而且其工作經驗局限於烏克蘭，故不列入考慮。

在前述的四人中，可按其背景分爲兩類。庫拉考夫（Kurakov）屬於舊式官僚，這類人沒有受過高深教育，但擁有多年的黨政管理經驗。這種特點在目前尚可作爲權力上升的憑藉，往後其效用則越來越小。庫拉考夫被視爲布里茲涅夫的親信之一。布上台後，庫拉考夫首先被派爲蘇共中央委員會農業組主任；不久升爲主管農業的中央書記，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

其餘三人可以姑且稱之爲專家派。這三人都是戰後工業工程研究所的畢業生；對重工業的企業管理，擁有廣泛的專業經驗。羅曼諾夫（Romanov）從事黨務已逾二十年，是從列寧格勒黨組織升入中央的，目前仍是列寧格勒省黨委會的第一書記。道爾格赫（Dolgikh）·一九六九年四月從克拉斯羅雅斯克邊區黨委第一書記直升爲中央書記，目前主管重工業。卡吐謝夫（Katushev），曾任高爾基省黨委會第一書記，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提升爲中央書記主管對共產集團國家關係。

可以說，庫拉考夫，道爾格赫和卡吐謝夫都是布里茲涅夫的人；就政策立場言，雖然在某些問題上有出入，但是沒有相反的意

見（參見前表）。羅曼諾夫雖然視「布里茲涅夫為領袖」，但是彼此之間，存有歧見。在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羅曼諾夫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可見他是一個正在上升的人物。很可能，在未來權力鬥爭中，羅曼諾夫會和庫拉考夫短兵相接。

以上是就個別的主觀與客觀因素所作出的推測，各人的性格未列入作為推測的變數。有人認為，作為克里姆林宮的主人，他必須具有機靈、冷酷和自我保護本能等特性；更重要的是，他必須使這些性格深藏不露^⑧。由此可以看出，這個因素很難具體描繪並進而定出可靠的指數，作為客觀衡量的標準。

權力轉移方式與社會條件

在最近的將來，蘇聯可能有三種轉移領導權的方式。

第一，布里茲涅夫主動有計劃地交出指揮棒。在這種情形下，他可以選擇他所中意的接棒人。如果他準備這樣做，下一屆蘇共代表大會（一九八〇年）將是最好的時機。在蘇共總書記更換的前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也將更換。很可能下一屆的中央委員會乃至於政治局將有較大的異動。布里茲涅夫也可以「光榮」地退出權力圈。

第二，布里茲涅夫病倒或突然死亡，留下權力真空。在這種情形下，非常可能由基里林科暫代，而在較年輕一代（五〇—六〇歲）的高層領導中將展開權力鬥爭。這又可能有兩種結果：其一，政治局可於短期內議定繼承人，再由中央全會表決；或直接由中央全會決定；其二，由基里林科繼續暫任領袖，俟下屆代表大會再決定新領袖的正式人選。

第三，在蘇聯的國內政策上發生嚴重問題，引起有組織的反對，布里茲涅夫被迫下台。在這種情形下，凡是布里茲涅夫的親信較難爬到蘇共權力的頂點。

在蘇聯，乃至在所有共產國家內，對外政策的失敗很難直接動搖最高領導人的權位。例如一九六二年的古巴事件沒有直接影響赫魯雪夫的領導地位；一九六六年蘇聯帶頭侵略捷克，未動搖布里茲涅夫的權位，雖然謝立斯特成了代罪羔羊。相反的，一國的內政問題往往導致一個共黨領導人的下台，波蘭的奧查布（E. Ochab）及戈莫卡（W. Gomułka）、捷克斯拉伐克的諾伏特尼（A. Novotny）等，便是明顯的例子，蘇聯自亦不能例外。

赫魯雪夫雖然逃過了一九五七年的「反黨集團」，但是沒有逃過一九六四年黨內的反對。一九五七年事件是因為他執行「地方分權」計劃引起的；而一九六四年下台最直接的導因是他十月二日所發表的「新經濟計劃」。客觀言之，赫魯雪夫所擬定的「計劃」都是根據當時社會條件的需求，並非與敵所致之舉。以一九六四年為例，當時蘇聯農業生產停滯，工業成長率下降，行政管理紊亂，思想控制鬆弛，任何當權者皆必須針對時弊擬定對策。事實上，布里茲涅夫所執行的內政外交與赫魯雪夫無甚大差異。所謂「

註⑧ 弗羅姆（J. Fromm），「布里茲涅夫的神祕——誰將主管俄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第三十四頁。

沒有赫魯雪夫的赫魯雪夫主義」並非全是中傷之言。

現在，再檢討一下當前蘇聯現時社會條件會不會迫使布里茲涅夫採取「極端」措施，而引發另一次「反黨事件」，迫使布氏提前非光榮地下台。最明顯的是，被布里茲涅夫列為主要目標之一的農業工業化的失敗，以致無法在糧食方面自給自足，而必須向資本主義國家大量購進，結果弄得外債累累^⑨。其次是工業成長率緩慢，因而導致主要城市的消費品短缺。此外，蘇聯既未能迎合俄羅斯人民的經濟與文化需求，又未能保證非俄民族幹部的前途出路，更未給予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或重視民權的要求。結果，在蘇聯社會中產生或醞釀各種反現行制度的社會運動。

根據流亡在外的蘇聯歷史學家亞瑪立克(A. Amalrik)說，在蘇聯境內現在至少存在着「人權運動」、「馬克斯改革派」或「蘇聯杜布契克派」，「新斯拉夫運動」，「宗教運動」，「民族主義運動」等^⑩。如今在蘇聯武裝部隊中也迭有「反叛」事件發生，且駕着飛機外逃或在軍艦上譁變，如果這些現象意味着各色反制度的社會運動已滲入軍中，發生影響，那麼事態就不很輕鬆了。爲了對付或防止這類事件，在一定的情况下，蘇共領導階層就不得不採取極端措施；而政策鬥爭就很容易轉變成權力鬥爭。結果，蘇共的權力轉移就難以第一或第二種方式實現。

結語

在共黨體制中，權力鬥爭是政治過程的大部分；由於缺少切合實際的權力轉移制度，權力轉移往往在政治上引起「繼承危機」。今日匪區就是如此，蘇共也正面臨着這種危機。當然，在程度上有差異。

布里茲涅夫政權確有穩定特性，但在另一方面，布里茲涅夫爲了維持這種穩定性而不願或不能更換上層領導，避免大力更張政策。結果，上層領導老邁，政府功能僵硬，難以適應正在質變中的社會。

貝林科等事件祇是蘇聯社會質變的表徵之一。在貝林科逃到日本之後的第四天，蘇聯官方正式公佈，「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諾波夫及內政部長謝羅科夫(N. Shchelokov)升爲陸軍大將^⑪。前者專司「安全」工作，後者亦與「安全」有關連，此時此刻發表晉級，是否表示他們的「安全」工作做得不壞，抑或藉此鼓勵他們進一步加強「安全」工作，似頗耐人尋味。

註⑨ 據合衆社報導，蘇聯目前約有九十一一十億美元之外債，見「共產集團的赤字」，中國新聞報(英文)，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第四頁。

註⑩ 美聯社電，中國新聞報(英文)，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第二頁；參閱，亞瑪立克，蘇聯將存在到一九八四年嗎？(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第五一四五頁。

註⑪ 紅星報，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第一頁。